

上海咨询信息 (月刊)

2013 年第 7 期
(总第 312 期)

主 办：上海市咨询业行业
协会

印 刷：上海欧阳印刷厂
有限公司

目 次

• 协会工作 •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会长、副会长
名单公告 (2)

上海咨询业行业协会七届一次会员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会
隆重举行陈慧琴 (3)

• 咨询专论 •

“三维市场体制”解析中国梦史正富 (6)

大数据与上海转型发展赵付春 (8)

• 专家观点 •

无需担心中国的增长会慢下来方星海 (11)

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 (13)

大数据真的是“未来的新石油”？孔建会 (17)

• 行业动态 •

《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圆满举行王鸣跃 (19)

协会参加如皋科技节和人才洽谈会唐勇 (21)

• 聚焦中国 •

文化产品出口有望成为外贸新亮点 (22)

• 世界瞭望 •

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 (24)

• 封二 •

上海东滩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 封三 •

七届一次会员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会掠影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和会长副会长名单公告

沪咨协字[2013]07号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七届第一次理事会于2013年6月25日下午在科学会堂举行。经过投票选举,会议产生了74名协会七届理事;理事会在七届一次理事会上选举产生了17名协会七届会长、副会长。经新一届会长推荐了协会秘书长。现予公告。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1	上海市工程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丁伟奇	董事长
2	上海大学预测咨询研究所	于英川	所长
3	上海中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山 瑾	副总工程师
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咨询中心	王 操	社科院副院长 / 咨询中心主任
5	上海震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王 翔	总经理
6	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宏祥	总经理
7	上海投资咨询公司	王融融	总经理 助理
8	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鹏	董事长
9	上海浦东新区投资咨询公司	王智勇	总经理
10	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计安平	董事长
11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孔祥云	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12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印保兴	董事长
13	上海求必应咨询服务服务有限公司	包云鹤	董事长
14	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吕志慧	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
15	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朱 雯	执行董事、总经理
16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朱 群	副总经理
17	中国轻工业上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朱学勇	总经理
1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朱盛镛	技术经济部总监
19	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	朱惠君	秘书长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协会	庄 峻	理事长
21	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刘万明	工程咨询部主任
22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刘伟杰	总院院长
23	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刘光顺	副主任
24	上海质量认证咨询中心	刘放鸣	主任
25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科技委办公室	汤 文	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26	上海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汤 伟	董事长
27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孙 红	董事长
28	上海市轻工业科技情报研究所	孙豪展	所长
29	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	李小钢	主任
30	上海化学工业区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李鉴之	总经理
31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	杜 蕾	副所长
32	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咨询公司	杨 珂	副总经理

33	上海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杨台英	董事长
34	上海联合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杨宏巍	执行董事
35	上海国际化建工程咨询公司	杨震东	董事、总经理
36	上海建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恩	董事兼总经理
37	上海万隆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吴越	总经理
38	上海台育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邱创盛	董事长
39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何刚强	董事长
40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汪天翔	副会长、法人代表
41	上海振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沈煜琦	总经理
42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张祥	
43	上海外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张天平	总经理
44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张玉鑫	院长
45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伟国	董事长、党委书记
46	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土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	张丽莉	综合办公室主任
47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俊杰	院长 / 院副总建筑师 / 党委书记
48	上海金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福存	董事长兼总经理
49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陆忠民	副院长、总工程师
50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陈超	副馆长、副所长
51	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陈必壮	执行董事
52	上海国际港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永庆	总经理助理
53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陈柯达	副总经理
54	沪杏科技图书馆	陈积芳	馆长
55	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	范习友	常务副主任
56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周海	总经理
57	上海档案咨询服务中心	郑尚怡	副主任
58	上海久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赵涛	总经理
59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祝波善	董事总经理
60	上海众瑞涉外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姚立良	总经理
61	上海岩土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夏群	技术质量部主任
62	上海华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顾中钰	副总经理
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造价咨询中心	涂群	总经理
64	上海大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谈德彬	总裁
65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郭辰健	董事长兼总经理
66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郭德利	副秘书长
67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曹文宏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68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崔勤	董事长、党委书记
69	上海工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	董锡健	总经理
70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喻伟巍	副院长
71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童静	董事长
72	上海市市政规划设计研究院	蔡逸峰	副院长
73	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潘久文	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74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薛晓风	副总裁

经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第一次理事会投票选举产生协会七届一次理事会会长、副会长:

会长: 张祥

副会长 (按姓氏笔画排名):

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律社会
咨询中心

王振

2 万隆国际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王晓鹏

3 上海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孔祥云

4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印保兴

5 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咨询行业
协会

庄峻

6 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刘光顺

7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汤伟

- | | | | |
|---------------------|-----|----------------------|-----|
| 8 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 | 李小钢 | 13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 郭辰健 |
| 9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 汪天翔 | 14 上海工业发展咨询有限公司 | 董锡健 |
| 10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 陈超 | 15 上海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 童静 |
| 11 沪杏科技图书馆 | 陈积芳 | 16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薛晓风 |
| 12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祝波善 | 会长推荐陈积芳为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长。 | |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
2013年7月5日

上海咨询业行业协会七届一次会员大会 暨七届一次理事会隆重举行

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七届一次会员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会于2013年6月25日在南昌路47号科学会堂二楼大礼堂隆重召开。

协会六届理事会会长张祥、副会长陈积芳、汪天翔、印保兴、陈超、董锡健、李小钢、祝波善出席会议。大会特邀请市科委体改处陈丽君、市社团局社团处徐国芳同志出席会议。会员单位共计162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汪天翔副会长主持。并作《关于第七届理事会换届改选工作的报告》，汇报了协会自2012年底至今的换届准备工作的经过。

陈积芳副会长作《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和对下一届理事会工作的建议》。从精心组织协会品牌活动；积极宣传会员单位、咨询精英的业绩典范；参与政府各项政策调研活动；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方面的咨询交流活动；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和规范管理五个方面总结了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针对上届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对下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建议第七届理事会要更好地发挥咨询协会的

行业指导作用，加强为会员单位的服务意识，扩大服务范围，也包括非会员单位；加大发展会员单位的力度；完成协会的规范化建设工作；开展协会的评级工作；以协会为平台，推动智库建设。

印保兴副会长作了《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协会2013年3月31日净资产总计5008275.20元，较上届理事会财务审计时增加393746.63元。其中收入合计5917901.78元，支出合计5524155.15元。

大会在认真听取了协会的两大工作总结报告后，举手表决通过了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随后，大会进入选举议程，产生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首先，大会介绍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荐产生的情况。理事候选人由会员单位自荐，经充分酝酿、民主协商，按照理事不超过会员总数三分之一的要求，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并考虑到不同咨询专业的代表性，推荐了74位人员为理事候选人。





大会宣读了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选举办法，举手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的名单。

投票完成后，监票人员进行验票、计票。总监票人宣读计票结果。

根据理事选举办法，第七届会员大会由每个



会员单位代表1人，总计224人组成。按规定，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会员代表（150人）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三分之二以上（100人）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第七届理事会选举采用无记名等额投票选举。主持人宣布，选举实发选票158张，实收选票158张。其中，全票赞成的156张。74名第七届理事会候选理事顺利当选。

在热烈祝贺新一届的理事后，召集人汪天翔宣读了第七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通过《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总结和对下一届理事会工作的建议》、《第六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选出了丁伟奇等74位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最后，市科委体改处陈丽君副调研员发言。她同时代表市社团局社团处徐国芳科长和市科技交流中心席芙蓉同志，祝贺换届大会成功进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希望：要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提高协会公信力；完善法人制度，规范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管理制度，做到民主办会、独立办会；提高与政府合作能力。

七届一次会员大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圆满结束。

随后，新当选的协会理事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主持

人首先介绍了新一届会长、副会长候选名单产生的说明；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候选人名单和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选举办法。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了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选举办法，进行投票选举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总监票人宣读计票结果，实发选票57份，实收57份，17位会长、副会长全部全票当选。主持人宣布：经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第七届第一次理事会采用无记名投票选举方式，选出张祥为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汪天翔、王振、王晓鹏、孔祥云、印保兴、庄峻、刘光顺、汤伟、李小钢、陈超、陈积芳、祝波善、郭辰健、董锡健、童静、薛晓风为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张祥会长为新当选的副会长们颁发证书。

张祥会长提名推荐陈积芳同志为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长，理事们一致鼓掌通过。理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协会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会费的提议》。在主持人宣读了七届一次理事会决议后，张祥会长讲话。张会长祝贺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圆满成功，并表示将带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再上一层楼，希望协会全体会员一起努力，为发展壮大上海的咨询业作出贡献。张祥会长讲话后，陈积芳副会长兼秘书长发言：要在会长领导下以创新精神和大家一起做好协会工作，不辜负全体会员的期望。

七届一次理事会在共同的祝愿掌声中顺利结束。

当晚，协会历届老会长聚会，祝贺协会新一届理事会成立，祝愿协会和上海的咨询产业有进一步发展。

（陈慧琴）



“三维市场体制”解析中国梦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史正富

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

过往 34 年，中国 GDP 中的消费占比约 59%，投资占比约 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低，投资占比高。然而，中国消费规模或消费水平的增长却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从 1979 年的 2000 多亿元，上升到 2011 年的约 23 万亿元。以 1990 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约为 7.9%，在中等以上的国家中名列前茅。中国的投资率确实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其他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以资本产出比这一综合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十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 3.38，近十年达到 3.95。横向来看，这一数据并不高于发达国家，如美国 1965 年到 2010 年的资本产出比是 5.29，其中 2005 年到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 22.64；日本从 1980 年的资本产出比是 14.69，其中 2000 年到 2010 年更是高达 37.16。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应。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将趋于稳定或微降。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人口红利同样先后作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不难发现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我认为，中国式超常增长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和

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式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经济制度类型。

在这样一个三维构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1994 年后的 20 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

在我看来，一个竞争性的、自谋发展、自负盈亏的体系，在纵向体制上是受制于中央的，是一元化的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一个层级。但从横向来看，这个县、市，比如昆山和上海，互相之间都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这样一来，全国 2000 多个县、市、省就变成了平等竞争的经济主体。对地方政府来说，交够中央的，留下自己的。因此就有推动本地的发展，增加财

政收入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控股型的企业集团。因此，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他是政府的，是中央政府的一层，受上级政府任命和领导；另一方面他是企业家，是企业控股集团的董事会和总裁班子，他要组织本地的资源，规划本地的发展，履行诸如融资、投资、创业、招商、扶持企业成长、帮企业卖产品、征地、雇工等职能。

中国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机制，有一个中央政府，这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样的，而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不同之处。企业进行投资决策、资源调配、人员招聘、产品出口、技术开发。这都是市场行为，国家并不干预企业的市场行为；中央政府也管着长期规划、宏观调控，这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但是，西方没有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并肩作战，两个轮子，两个发动机，同时推动经济增长。查一查历次有关改革的辩论，就会发现这种话语是来自于地方政府。在东欧和前苏联，中央领导人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但是领导改革的各部委不支持。但在中国情况不一样，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人事上，地方和中央之间不断轮换，官员之间互相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平等交流，因此拓宽了中国的政治空间，推动中国的改革在危机中前进，遇到困难不是后退，而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改革的“弯弯绕”变成了改革的“螺旋式上升”，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

中国的现行“三维市场体制”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多了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决策空间。使中央政府从当年计划经济下微观地管，集中到宏观地管，现在最多是行业管控。中央政府的职能由此发生了改变，我把这叫“长期国家发展管理”，区别于美国和欧洲那种短期的宏观调控。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的出现又导致了第二个变革，产生了一系列西方市场经济不存在的经济规律，或者说改变了西方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

首先，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投资率，长期来看显著地高于西方。原因何在？中国操心的问题

从来都是经济过热，而在西方是经济反周期，需求不足是他最大的问题。而在中国，从来只有经济过热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三维”市场经济中的“一维”，即地方政府，在企业分散性的投资建设中提供了一个起始性投入，导致了一个在同等规模的创业行为中，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低于西方，因此投资回报率高于西方。经济学上很容易证明，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整体的绝对投资率要高于西方。其次，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第二种交易费用低于西方。交易费用在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中，表现为交易、合同、财务咨询、法律服务、政治游说，等等。而在中国，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帮助投资者创业，因此他们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中介服务，而且免费。这种中介服务效率高、速度快，有时候引发不公正，比如征地问题等，但这些不公正只能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简单地说，第二种交易费用决定企业创业和成功的概率、速度，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市场经济显著高于西方。

当然，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个复杂的多面体。辉煌的背景后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或许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而只能诉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

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发展的建议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在新的增长阶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仍将有效运行，但是，国际超常购买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消失殆尽。长期来看，虽然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发展空间，但他们只是市场经济常态运行下的需求，对应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经济增长。如要实现前述的超常增长，则需要市场体系之外的某种第三方需求。过去，他是以美元超发

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今后，有什么类似的长期购买力可以代替呢？

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下，中国的储蓄规模必然过大；另一方面未来增长的供给方面存在诸多约束，从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到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都需要长期巨大的资金投入。相对自然环境良好的欧美国家而言，这是打造国家基础资产所必需的“额外投资”。相对国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这是构造和谐社会必须的基础工程。所以，实现未来超常增长的关键，在于寻找到能使过度储蓄与额外投资相联结的恰当机制，从而使两方面的难题同时解决。

为此，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就不失为一种选择，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

的同时，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即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出现的投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的基础工程，只要运行正常，它极有可能成为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可以充分预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之时，在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上，中国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在全球范围内的制度竞争中，体现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作为有悖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它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而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贡献出中国智慧。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中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稳、走好，中国梦的实现就不会遥远。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

大数据与上海转型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赵付春

对于上海而言，大数据具有无限的魅力：它挺立于 IT 产业的高端，吸引着产业和资本的无数眼球；它枝藤蔓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应用和创新，不经意间就掀起一场行业变革的风暴——对于正处在转型发展中的上海来说，它的到来适逢其时。

大数据和决策制定

上海是海量数据的信息枢纽，大数据对于上海要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服务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的先行先试，率先迈向智慧城市这一目标，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大数据所影响的不是某个特定行业，而会波及所有行业。但在初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些率先迈入数据密集型、基于知识创新、个性化要求高的行业，如

金融、保险、医疗、零售、电信等有机会先行一步。

在后工业社会中，大数据并非孤军挺进，智能技术支持决策制定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支持，包括服务经济占主导（尤其信息服务业）、专业技术阶层的优越地位和理论知识的首要位置（反映在研发投入上）。

从上海这几方面的发展看，2011 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 60%，信息产业增加值（制造加服务）占 GDP 比重达 9.9%；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为 61.3%；全年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3.16%。这些指标数据与全球同类城市如新加坡、香港等相比并不落后，为大数据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大数据辅助决策是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其基本要求。

作为特大型的国际都市，上海一直强调以创新驱动来解决诸多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但是

创新驱动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科学理性的决策。而决策必须基于上海的现实,如市场竞争格局、辐射力,市民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人口统计、地理空间等,这些数据的总和构成上海发展可资利用的大数据。没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数据分析方法,很多决策质量将很难真正上水平,而且可能蕴藏着巨大的误判风险。

大数据和 IT 产业升级

上海要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就必须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把握住大数据这一 IT 产业的关键。

从近年来国际大型 IT 企业的频频收购活动也可以察觉出大数据是 IT 产业的关键这一动向。

IBM 在将一些硬件业务出售给像联想这样的公司的同时,也加大了对软件公司收购的力度,包括著名的智能软件 Cognos 和分析软件公司 SPSS 等。

谷歌收购了 Measure Map 统计分析程序、深度搜索应用公司 Tranformic、网站流量分析和统计公司 Urchin 等,都跟大数据直接相关。亚马逊、Facebook 等公司也都在富有远见地布局大数据产业。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不仅仅需要相应的智能化技术,还需要对行业或城市管理有深入的理解,它构成了整个 IT 产业链中知识最为密集的环节,占据着行业的高端。

在 IT 产业中,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机会主要掌握在两类公司手中:一类是 IBM、微软、惠普等公司提供“硬件+软件+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平台性为特征,提供基础服务;另一类是以 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为代表,基于海量的用户信息,提供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广告推介等活动。此外,新兴的创业公司通过出售数据和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单个解决方案,在特定行业和区域复制前两类公司的大数据服务模式。

从国内来看,上海 IT 产业在人才、技术研发、与国际接轨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和就业人数居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之首;信息服务业的产值在服务业中排名达到第五。但在这貌似光鲜的高科技产业背后,仍然存在产业链层次偏低的问题。IT 业内程序员、维修、销售服务等工作被

讥称为“IT 民工”,其体力劳动量远大于脑力劳动量,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低端。

抓住大数据发展的机遇,上海要充分挖掘被企业和政府部门“养在深闺”、大量的本土消费和市场行为数据,获得本土或行业的比较优势。大数据拥有单位如果能加以重视,与国内 IT 企业协作开发,激活这个沉睡的巨大金矿,就可能成就上海自己的、在不同细分行业的 IBM、谷歌和亚马逊,引领整个中国 IT 服务业走向高端。推动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上海 IT 产业自身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更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和城市管理的升级,真正打造上海城市建设和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制约大数据发展的四个瓶颈

从大数据的启用到最终价值的创造,是一连串的事件,需要观念的转变、大数据知识的传播、基础设施、人才、法律等基础条件。目前,这些构成了制约上海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四大瓶颈。

观念瓶颈:根据 Gartner 的 IT 生命周期理论,目前正处于对于大数据认识的泡沫化阶段,需要有一个价值理性回归过程。作为决策层,既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轻易否定其价值。这时候,尤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大数据的出现对于经济社会有何种影响,如何影响本行业,对此我们准备好了吗?当前制度与之适应性如何,需要进行何种变革和创新,甚至提交到立法层面来解决?在如何利用大数据方面,站在城市层面,是否可能形成一个战略规划,明确基础数据的良好治理机制,以保障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政府可以为市场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撑,等等。从目前“小数据”的开发利用来看,上海仍存在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共享的观念还远没有普及,数据管理的制度仍需健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浪潮,形势不容乐观。

能力瓶颈:上海企业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大型企业如宝钢、电气集团等信息化应用相当成熟,管理水平在逐渐向国外一流公司看齐。但仍有相当比例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信息化水平欠佳。据市经信委的调查,约 70% 的中小企业没有专职 IT 人员,管理仍停留在经验层面,拍脑袋决策的事情不在少数。这将很难培育出大

数据的能力。虽然中国的技术方面也落于人后，但最大的障碍在于技术的应用和管理能力。上海必须重视提升企业信息化管理能力，夯实好基础。

法律瓶颈：在互联网环境下，哪些数据开发行为属于合理开发，仍缺乏一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对个人信息保护也无法可依。加之人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一些部门利益的重要来源，导致立法进程迟迟不能启动。相关法规缺位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出现了逆向激励：对于个人信息合理的开发受制种种约束，而信息滥用者借助于种种暗箱操作，反而逃避了监督。这种环境下，推动大数据这个金矿的开发，存在非常大的法律风险。

文化瓶颈：各类组织，包括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对大数据知识的了解和技术掌握，有个学习过程。从长远看，根本性障碍还在于对基于数据的决策抱怀疑态度的决策文化。这既与数据本身质量不高有关，也与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分不开。反映到决策上，往往更加相信直觉，而不重视数字。尽管上海具有相对开明睿智的城市文化，但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性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间。

推进措施和建议

上海是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航运等领域海量数据的集散地，具备得天独厚的大数据优势。在推动大数据发展问题上，上海可以大有作为，这体现在路径选择、环境营造、基本保障等三个维度。

从路径选择看，可以将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两种方式结合。

从上而下，强调数据共享和整合，解决现有数据孤岛问题。近年来，上海斥资建成了各种平台，包括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大型企业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高精度位置服务平台、各行业信息服务平台以及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等，为大数据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数据发展的要求是接入和共享，这需要关注于底层数据的连通。但数据共享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制度和利益协调问题，需要高层的承诺，各方认真协商解决。这一工作的难度并非上海所独有，美国白宫的数据共享问题也仅仅是奥巴马上台之后强势推动下才初见成效。只有在共享问题得以解决后，

大数据这座金矿才能充分得以开发，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下而上，强调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撬动大数据的发展。上海可以从应用端出发，以小型应用和微创新为突破口，引爆行业的大数据发展。如可以鼓励医院、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现有金融保险、航运企业、大型制造企业、零售等数据量丰富的行业龙头企业，以大数据为纽带，各自开展微创新，激活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微创新的作用在于不断尝试和改进，找到一个更好的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大的创新。如能基于高质量的大数据分析，创新效果会更好，成本会更低。同时随着应用的深入，自然而然对其他部门数据提出共享需求，最终有助于不同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

从环境营造上，上海可以从内外部两方面着力，推进大数据的发展。

从内部看，上海应着重激发基于大数据的创业创新精神。大数据产业链主要是一些国际大数据公司所主导，目前上海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企业，只能依赖于细分市场和特定环节的突破，激发出中小型创业型企业的创新精神，培育一批基于数据的决策的创新型企业及中小型创业型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拼出一条血路。

从外部看，主要还是通过筑巢引凤构建大数据产业链高地。上海享有地域、技术、人才、市场、行政效率和透明度高等多种优势，IT产业集群优势也非常明显，借此可广泛吸引国内外企业将大数据行业分析中心设在上海，就地应用和试点，作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支持对象。

保障机制方面，主要涉及立法突破、人才培养和决策文化等三方面。

其中，在大数据立法上有所突破，是关键一环。大数据立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应放在计算机和互联网信息安全和保护这一大的框架下，在地方层面，灵活借鉴各先进国家和城市经验，规定对信息利用的合理边界，保护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另外，根据迈尔-舍恩伯格的建议，大数据年代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对公民隐私进行保护，应该有一种遗忘机制。而这一机制类似于档案的销毁，也应有法可依，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同时，人才是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基础。据麦肯锡的估计，仅在美国，大数据技术人才缺口达14万-19万，管理人才150万。上海应开始重视对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育，还要意识到国际性人才争夺战的激烈性，既要培育出人才，更要留得住人才。最直接相关的专业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大数据技术研发人才，主要为计算机科学和技术专业；第二类是数据分析和人才，主要包

括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专业、数理统计专业等。

最后，还要倡导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文化。近年来，上海在努力建设智慧城市中已经应用了大数据的理念，但仍存在一些凭经验和直觉决策的区域。大数据的决策本质特征是公开透明和科学理性，这可以改进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倡导这一决策文化可以有效改变公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深化上海服务型政府建设。

(来源：《东方早报》)

· 专家观点 ·

无需担心中国的增长会慢下来

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方星海

最近，中国经济有增速下滑的种种表现。比如说1~4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多年来首次同比下滑；5月份汇丰刚刚公布的中国制造业指数(PMI)只有49.6%，七个月来首次跌破50%这个荣枯分水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及某些地方因为环保等问题出现的游行、反对等情况。

作为大国，不可避免总有很多问题。然而，对于中国在目前这种全球性危机持续、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有什么优势，能够做什么工作，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第一，中国现在处于对外开放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增量市场上来看，中国包括汽车、化工、电梯、金融服务等几乎所有行业现在在全球基本上都是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这决定任何大型的跨国企业，无论它是在制造业领域还是在服务业领域，都不能放弃中国市场，如果它在中国市场输掉，就很难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这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到中国市场来，而且它要在中国市场上获胜，就必须把

它新的技术、新的研发力量、制造业的最好的技术放到中国来，否则它很难在中国市场上获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若干年前可能二流的技术在中国也会获得很好的市场，现在很难了。(比如通用汽车，就把它最高档的车凯迪拉克的研发总部、最新的技术和产地都放到上海来，在中国的高端车市场跟奔驰、BMW、保时捷竞争。我相信这样的趋势在其他行业也会发生。这是中国的很大优势，也许国内有些企业研发还上不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开放，通过最大国内市场的强有力的竞争环境，促使技术领先的国外企业把最新的技术放到中国来。)

第二，中国企业到海外参与收购兼并或做合资项目有很多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有的。一是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很多国外企业因此愿意被中国的企业兼并，或进行战略合作。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沃尔沃被吉利兼并，我想就是因为吉利是一家中国汽车公司，兼并以后沃尔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有可能获得非常大的提升。二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的

资本市场本身不是很发达,但是资金实力非常强,中国企业的收购兼并已经得到国内银行和资本市场在资金上强有力的支持。这也是中国非常大的优势。三是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开发出一些适合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适用的技术。

第三,中国现在服务业发展机遇非常好。金融、教育、医疗卫生、消费通讯等服务业的市场机会非常好,潜力巨大。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外开放,相信国外最好的服务业企业都会到中国来。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谈到,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服务业方面的需求成长速度非常快,如果说我们抓住机会,在服务业方面有更大的开放,相信我们会吸引世界最优秀的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迅速提高我国服务业的质量。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重要机会。中国可以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有其他一些国家愿意让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感到只有人民币现在是一个潜在的国际货币。如果大家有进一步的共识,着力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人民币非常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十年左右,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至少是贸易货币,今后慢慢发展成为投资货币,最后成为储备货币。

从国内来看,也有四个我们国家能做,别的国家不太能做的事:

第一,我国中央政府可以发行大量的长期债券。到去年年底,中国国债占GDP比例大概是14%左右,这在全球是非常低的。不是所有国家想发国债都能够发得出去,欧洲很多国家现在想发也发不出去,而中国发长期国债的潜力非常大。而且我们的长期国债绝大部分都会被国内的投资者所抢购,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储蓄,不需要外国投资者来买。长期国债短期内可以迅速促使国内需求上升,收集来的资金可以用于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本来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还可以大大提升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更多地投资教育。另外,发行长期国债对金融市场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我国金融市场,储蓄很多,但是可投资的品种非常少,很多钱投在影子银行等各种各样不规范的理财产品上,风险很高。长期国债一般有5%以上的收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愿意投资。这对完善整

个金融市场体系,减少金融风险也非常有帮助。

第二,我们有大量的民间资金急于进入各个不让它们进入的行业进行投资。比如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上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创业了,积累了一些资金。由于我们不让这些资金进入很多领域,结果只能去炒房地产,炒大宗商品,搞高利贷,造成很大的金融风险。其实这些资金很愿意进入我们的金融、教育、卫生、信息服务等领域。如果说他们能够进入这些领域的话,对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会很有帮助,也可以避免他们在太阳能、生物科技等一些不熟悉的领域乱投资,造成投资失败和新的产业风险。

第三,就是大家谈得最多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最大的内需。当然,中国的城市化也面临非常大的问题,我们不能拔苗助长,为了城市化而建很多楼。而应该把人口政策、户籍政策等阻碍人口经济发展正常流动的障碍去掉,使城市化以更快的、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

第四,如果我们的生育一胎政策有所改变的话,可能会产生非常高的效益。或许要归功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对孩子、对家庭的观念非常强。特别是中国的中高收入群体,甚至愿意为孩子付出较高的个人代价,不像其他国家,收入高了,很多人不愿意生孩子。比如,我有一个同事,她三十出头,非常能干,就为了生二胎辞职了,这造成多大的人力资源损失!当然计划生育在中国是要的,但如果在生育政策上有所考虑,我想这个同事可以不因为多要个孩子而丢掉工作。另外,如果我国的出生率进一步提升,能很快带动大量内需。小孩带来的需求是很强的,而且中国人重视教育,十几年、二十年后这些人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这八点都是现在马上就可以做,而且是其他国家不太容易做好的。要谈中国的机会,我们还要再退一步看中国本质上最强有力的竞争点在哪里。中国跟别的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有两点:

一是中国有13亿非常勤劳的人民,这在全世界是不容易找到的。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我相信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么大,它的劳动人口有这么丰富,它的人民有中国人民这么勤劳,这是中国最最基本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使得无论中国劳动力成本

如何上升,要素价格如何上升,中国的出口在全球都会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数据也显示了这一点,即使在目前的困难局面下,1~4月份中国的出口还是增长了10%左右。

二是中国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是非常愿意帮助企业发展好的政府。全球不见得有比中国政府更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当然,中国现在风险也很大,这些优势能否发挥出来,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把风险考虑透彻,并妥善化解。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风险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风险,另一个是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但是我认为,这两个风险我们是完全可以很好地加以管理的。我国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贷款,都有土地或者房产作抵押的,要处理这样的融资结构当中的风险,关键是要“以时间换空间”。首先现在新的贷款,新的融资要慢下来,不能像前几年那样继续膨胀。然后不能因为一有企业还不上贷款,就迫使它破产,而应该通过延期等办法往后推。只要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的增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几年以后这些土地、房产和其他资产都会值钱。90年代我国银行业改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信贷资产管理和重

组,当时的情况比现在还糟,不良资产率是30%多,我们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到2003年的时候,原来看上去不值钱的资产后来都值钱了。我们能够在经济增长当中处理危机。而且中国处理危机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有大量的国有资产,这是我们的缓冲,别的国家没有。所以我相信,我们把这些风险想透,会发现是有办法化解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停下来只是去处理风险,不抓发展,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只要继续发展,在发展中处理这些风险是可以的。

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机会更多。这些问题很多牵涉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能否推进关系到最终成效。中国的政府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工作的政府,现在经济增速在下滑,这就要求必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改革步伐。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了,改革开放就会加速,所以大家不需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会由于既得利益等某种因素的阻碍,会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会缓慢下来。只要把风险想透,把处理风险的措施想清楚,做好安排,我们就可以大踏步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然后在发展中处理这些风险,中国的经济就会上一个新的更大的台阶。

(来源:《上海科学报》)

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张维迎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多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

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

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 1978 年的第 23 位上升到 2007 年的第 3 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 30 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 2007 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 10 大上市公司有 5 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历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像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能买得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等原材料）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

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作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

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作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作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 200 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就越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

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入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 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 WTO 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 30 多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

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 30 多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

（来源：《和讯财经》）

大数据真的是“未来的新石油”？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孔建会

当前IT业最热门的话题应该就是大数据了，这个两年前才被炒作起来的概念，现在已无处不在，占居了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它与云计算一起成为未来信息技术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处于IT行业的人们，如果不知道大数据，不了解大数据所创造的那些神话般的故事，就好像已经跟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那么什么是大数据？现在还没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它同云计算一样，是一个形象但却笼统的概念。大家一致的理解是从4V的角度来描述这一概念的内涵。所谓4V就是说大数据具有体量巨大（Volume）、种类繁多（Variety）、实时处理（Velocity）、数据真实（Veracity）的特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互联网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世上所发生的每件事情，人类所进行的每项思考，社会所进行的每点进步，知识所增加的每种内容都可通过互联网进行汇集。网络技术、传感技术与射频技术使各种事物都可产生大量数据。事物的内容、时空、方位、特性都可转化为数据，这些经济的、社会的、规范的、杂乱的、简单的、复杂的等各式各样的数据代表了不同事物的内涵。代表不同事物的海量数据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汇集，汇集后的整体数据反应了事物的本质特性或发展趋势。而这种反应事物本质特性或发展趋势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高性能计算机的数据提取、价值分析、数据表达等大数据技术，可以从大数据中把这些价值提取出来。不同的需要可以提取出不同的价值，所有的价值都可以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大数据的本质。

大数据，这一鲜明而又形象的概念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许多像亚马逊、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为它杜撰了无数神话般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人们，大数据具有无所不能的洞察力。它可以象伟大的先知一样预测未来，可以利用玄

妙的相关关系推测人的喜好，可以利用宠大的数据窥探人的内心，可以利用趋势分析引导人的行为，甚至可以用事物发展曲线来控制人的思维，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大数据利用最多的地方是商业领域。大家都知道尿布与啤酒的故事，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利用推荐系统，向不同用户提供不同的产品推销方案，提高产品的销售量；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就是通过购物记录来分析少女怀孕的案例，通过分析用户的购买行为，推测用户的现在状态与未来需求。尽管这一案例因为侵犯别人隐私而广受批评，但却说明了大数据分析在商业领域的价值。还有无数这样或那样的故事，都说明大数据在分析人们的喜好与购买习惯上的巨大作用，利用这种分析，商家可以更好地进行营销。权威的市场调查机构说，大数据将会改变未来的商业规则，实时竞价系统（RTB）、更加智能的推荐系统以及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智能分析（BA），使企业能够生产更加适合用户喜好的产品，能够找到向用户推销产品更好的方法，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更多的效益，大数据的这些功能将会使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大数据的另一个应用领域就是社会公共领域。利用大数据，政府可以更好地管理社会，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教育部门可以更好地获取与传播知识，提高民众的素质；卫生部门可以预测重大流行疾病的发生，提前作出防范预警；安全部门可以监控社会状况，确保国家不受破坏。谷歌公司前几年利用大数据绘制了“世界流感地图”用来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地流感的发病情况；利用大数据预测禽流感在各地的爆发趋势，为民众提供预防建议，向卫生部门提供监控资料。在公共安全领域，大数据也有巨大的作用，如美国就建立了基于各种传感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

监控系统，预测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比如爆发大规模游行活动、可能遭受的恐怖袭击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的应用也延伸到个人服务领域。穿戴式设备的产生标志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到了以人为中心的阶段。像谷歌眼镜、苹果手表这样的穿戴式设备把技术与人体结合起来，使人类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这些穿戴式设备利用大数据为个人提供学习、生活、健康等方面的数据服务。大数据通过穿戴式设备发挥其作用，同时穿戴式设备本身也成为收集数据、构建大数据的来源。穿戴式设备作为一种工具，大数据是其服务的内容。

大数据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让一些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倍加关注，很多大型信息公司也把大数据当作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视大数据发展的国家，也是利用大数据较好的国家。美国政府把大数据作为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认为大数据将引起信息技术发展的革命，改变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2012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把大数据称作“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石油”，把发展大数据研究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为掌控这一“未来的新石油”，引领世界技术发展方向，联邦政府制定了大数据研究发展计划，推进相关研究机构进行科技研究和创新发现。改进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价值的方法，提高从数据中获取知识的能力，加速美国在科技领域中的前进步伐，确保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政府指定了国家科学基金（NSF）、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能源部（DOE）、国防部（DOD）、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地质勘探局（USGS）6个联邦部门来负责推进大数据的研究，并计划投资2亿美元用来研究收集、储存、保留、管理、分析和共享海量数据的技术。

政府的投入与政策的支持，使那些本来就注重大数据研究的公司更加主动，纷纷加大对大数据研发与利用的投入，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如Apache基金会开发的Hadoop分布式处理系统，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现已成为大数据处理的标准结构；微软开发的Windows Azure平台使大数据的处理更加人性化、简易化；还有其它公司，经

过不断的创新研究让大数据技术更加完善、更加实用。技术的发展使大数据的价值更加突显，人们对它的期望也不断提高。据说谷歌公司利用大数据不但可以预测流感的发生，也可预测美国的经济复苏情况；不但可以预测明年服装的流行色，也可预测某位娱乐明星是否可以红遍世界。谷歌公司最近一个广为流传的大数据案例就是，在2013年的奥斯卡电影节上，它预测准了大部分的奥斯卡奖项得主。Facebook也是利用大数据的典型公司，大数据是这家社交网站最大的价值所在。通过对大量社交信息的分析，Facebook可以了解用户的生活习惯与购买喜好，利用定向推荐广告，为这家年轻的公司每年创造上百亿的产值。

还有许多真实的或杜撰的有关大数据的美妙故事，每一个都反应了大数据在某一领域的巨大作用，这些故事的汇编，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大数据主宰的奇幻世界。在那里，人们利用大数据可以预测任何一件事情的发展趋势，可以完成一切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先知、都是智者，在大数据的支持下，每一个人都通天文、晓地理，前知一千后知八百，如齐天大圣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实现很骨感。至少在当前大数据还没有那么大神奇，就连谷歌公司所说的利用人们的检索词可以用来预测流感的发展这种人人都相信的故事也没能发生。当H7N9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谷歌没能给出任何有关这一流感发生与发展的预测，更不用说事先给民众发出预警，提醒人们防范了；欧洲的金融危机持续了五六年，至今没有一家大数据公司能预测这场金融危机何时结束，就连未来是向好还是向坏发展的方向都不能预测；在商业领域，个性化广告推荐这种理应可以做好的事，大数据也没能表现出其超强的功用。最近经过大数据改造的淘宝网个性化推荐系统没比五六年前好多少；号称利用大数据使图书销售量大幅增加的亚马逊网站上推荐的书，没有一本是我喜欢的。

2013年4月15号，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现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美国人悲伤地发现，那些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的网络监控系统，并没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大数据分析在防

范恐怖袭击方面,并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看来这个被称为未来技术竞争至高点的大数据,在当下还不能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用。

产生如此悲观想法的原因,一是虽然大数据可能代表了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方向,具有光明的前景。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与相关的配套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大数据还不能发挥其巨大作用。二是大数据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所具有的内涵还不能被清晰地诠释。美国把大数据被称作“未来的新石油”,然而石油是不可再生的,数据却是随时随地都在产生,越是往后产生的数据越多,数据的准确性越高,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越强,这让人们对现在就收集并占有大量数据的必要性产生怀疑;还有从大数据中提取价值首先要有需求,没有需求就不知道从大数据中提取什么,当人们的思维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掌控数据,还不知道大数据到底有什么用处时,很难对其产生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数据收集的方向,没有方向的收集就会造成巨大浪费;在方向不明的时候,唯一可做的就是收集所有可能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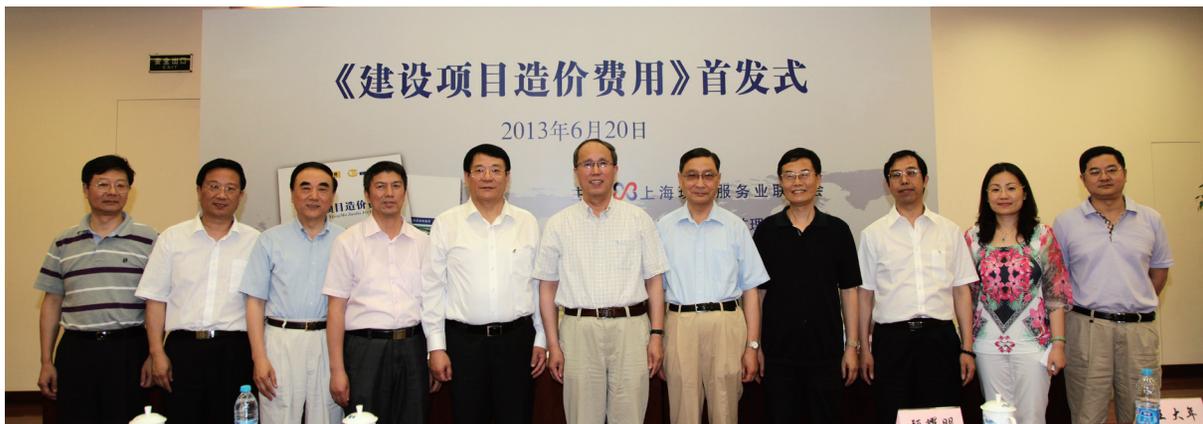
集到的数据,然而这样不但会给数据的存储、管理造成具大的成本,也会产生一些法律的问题,例如是否会侵犯他人隐私等。再有,随着科技的发展,穿戴式设备会不断智能化并在生活中得以普及,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智能设备本身就会不断分析所取得的数据,提取个人的喜好等特性,学习与适应人的品性,具有人的品性特征,这样就使得从大数据中分析人的品性失去了意义。

以上这一切都让人们们对大数据的发展未来产生了怀疑。因此,当美国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把它看成“未来的新石油”时,世界其它国家虽然也十分重视这一技术的发展,却没有制定相关发展战略。这有可能是其它国家在大数据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还不能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也可能是人们对这一技术的发展前景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无法确定大数据是否真的可以引领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还是暂时忘了大数据吧!别再关注那些炙热的概念炒作,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大数据的真正内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行业动态

《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圆满举行



领导与本书主审、主编、副主编合影。从左至右:顾耀明、许智勇、赵效定、汪松贵、印保兴、周禹鹏、姚念亮、张毅、周培康、朱虹、王大年



6月20日,《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在黄浦江畔的小陆家嘴滨江大道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一楼大厅举行。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主持首发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工作党委书记许德明作重要讲话。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单位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承办了新书首发式。

《建设项目造价费用》是一本面向建筑市场与社会多方面的集权威性、系统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查询建设项目造价费用的工具书。周禹鹏会长任编委会主任,并为该书作序。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印保兴任《建设项目造价费用》主审;曾编著10多本建设工程管理相关专著的张毅担纲主编。编委和参编人员多为政府主管部门、境内外咨询企业、行业协会、建设业主、高校、法律界的领导、企业负责人、资深专家、专业人员等。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是现代服务业专业咨询服务中一个十分重要、且处于前沿的新兴行业。而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更是体现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服务水准的重中之重。《建设项目造价费用》这本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一线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工具书的出版,必将受到广大专业人士的欢迎。

周会长首先对《建设项目造价费用》的出版表示祝贺。他说,在《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问世之际举行新书首发式,对推动专业咨询服务业多出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引用我们老市长徐匡迪所用的“高端服务业”这个概念,咨询服务业本身就是高端服务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该书主审印保兴作了主旨发言。他首先对周

会长和有关领导、管理部门、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等,以及所有参编人员和参编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在发言中重点介绍了编著的指导思想,以及该书所具有“目标明、立意高、内容全、章节新、范围广、服务强”的六项特点。

上海华瑞建设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兆蒙、上海市卫生基建管理中心副主任姚蔡、利比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庆等三位来自本市不同专业特点工程咨询机构的代表,以资深专业人士的眼光对新书作了高度评价。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赵效定、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智勇则从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和上海市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协会的角度表示了对新书出版的支持和对专业咨询服务业多出成果的希冀。

最后,许德明书记作重要讲话。他说:我代表上海市建交委,首先要对印保兴同志和张毅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的出版,对我们整个建筑市场规范投资行为、规范建设项目的管理,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依靠现代服务业和各个协会,把我们上海的建设工程搞得更好,使我们的建设市场管理更加有序和规范。

代表发言和领导讲话气氛热烈,引起与会者共鸣。周会长说,如果就新书首发来讲,我们已经是第三本了。第一本也是在这里,原国家外经贸委副部长、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会长张祥,写过一本专门讲服务贸易的书。第二本书是联合会和复旦管理学院共同合作编写的,关于上海服务业“五新”100例。第三本,即今天由印保兴、张毅两位编审的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希望这本书出来之后能够对我们建设工程咨询行业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周禹鹏会长将他亲自签名的新书赠送给所有参加首发式的领导、企业负责人、资深专业人员等,并与大家合影。

《建设项目造价费用》首发式取得圆满成功。

(王鸣跃)

协会参加如皋科技节和人才洽谈会

6月22日协会参加了“第十六届如皋科技·人才洽谈会”。大会共吸引了全国7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本会会员单位之一的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作为上海代表团的牵头单位，组织了上海市科研院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的学会、协会和科技、金融机构、大专院校和技术经纪机构等共70名代表参与本次活动。上海市科协协会中心应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邀请，组织咨询协会，并通过协会组织部分企业单位参加了活动。



会议开幕式上，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与如皋市科技局签订了技术转移服务合作协议，我会副会长，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副主任刘光顺为“上海-如皋技术转移服务站”揭牌。本次洽谈会达成130多项正式科技合作协议，上海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科院化学所和材料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技合作项目在大会上进行了集中签约。在如皋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高新区（城南街道）电子信息产业园、光电科技产业园、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园等处。并对接了10余项如皋地区需求技术。

在活动组织期间，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与如皋市科技局合作，采集了136项如皋企业技术需求信息，并以信息沙龙形式将项目需求分发至各技术经纪机构和院校，旨在发挥上海技术成果资源优势，推进上海成熟技术转移，服务周边区域经济发展。

如皋市隶属南通地区，位于长江入海口，总面积1477平方公里，距离上海的嘉定区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是首批对外开发开放的沿海城市，是长三角最具投资价值的市县。靠江、靠海、靠上海是他们提出的最具竞争力的口号。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591亿元，人均GDP达到46580元，完成财政收入129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基础基本竞争力排名第32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皋感受到：知识经济的时代，人才与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为此如皋市委、市政府推出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和“科技项目引进战略”。与全国14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在产业发展中发挥支撑作用：例如重点发展的船舶海工及配套、新型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及精细化工材料三大支柱产业，机械冶金、纺织服装、新型建材和食品加工四大传统产业。

通过本届如皋科技·人才洽谈会，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与如皋市科技局建立了长期合作的技术转移服务平台，成立了以解决如皋企业科技创新需求，推进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站。借助工作站了解如皋的产业结构、现状和产业优势，吸引优质项目在如皋落地转化，形成效益，以此构建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平台。

（唐勇）

文化产品出口有望成为外贸新亮点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出口文化产品21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3%。

近年来,世界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国内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环境不断优化,对外文化贸易额大幅提高,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8.1%,我国文化服务出口额年均增长20%;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例由2003年9:1下降到2011年2.1:1。2012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达217.3亿美元。

近日,来自广东得理乐器公司的一批钢琴及配件、架子鼓等产品,经拱北海关快速通关后启程运往美国。

作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的得理乐器,是国内最大的数码电子乐器研制企业,生产的电子架子鼓、电子琴等产品畅销海内外。该公司经理曾超群告诉记者,生产线均满负荷运转,订单已签到今年下半年。

在浙江,文化产品出口增势良好。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浙江省文化产品出口额达4.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92.5%。其中,义乌文化产品出口额高达1.7亿美元,同比增长9.7倍。

2012年,我国出口文化产品217.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3%。文化产品出口的崭露头角,有望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新亮点。

出口增长势头良好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出口方式日趋多元,出口区域不断扩大去年,我国文化产品月度出口值总体呈现冲高回落企稳态势,9月份创下25.9亿美元的新高后,10月、11月

出口值环比持续下滑,12月份出现反弹,当月出口21.2亿美元,同比增长35.4%,环比增长27.5%。今年前2个月,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在出口的文化产品中,一般贸易占主导地位。去年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文化产品总额为149.8亿美元,增长48.3%;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48.9亿美元,下降31.4%。

我国文化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欧盟和美国,对拉丁美洲、东盟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较快。去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文化产品61.5亿美元,下降3.8%;对欧盟出口51.7亿美元,增长1.6%;上述二者合计占同期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52.1%。同期,对拉丁美洲、东盟、非洲分别出口了17.2亿美元、15.4亿美元、13.6亿美元,同比增长72.2%、120%、120%。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主体为私营企业。去年,我国私营企业出口文化产品135.2亿美元,增长59.8%,占同期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6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出口68.3亿美元,国有企业出口10亿美元。

视觉艺术品为我国主要的文化出口产品。去年,我国出口视觉艺术品142.1亿美元,增长52.5%,占同期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的65.4%;出口印刷品28.5亿美元,增长7.1%;出口乐器14.9亿美元,增长6.6%;视听媒介产品出口28.4亿美元,下降44.2%。

政策扶持金融给力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实现快速增长,明显受益于政策扶持和金融支持我国文化产品贸易起步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小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步伐加快,成为对外贸易中增长较快的类别。

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之所以实现快速增长，一系列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功不可没——

去年2月份，文化部正式发布《“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明确提出要“力争实现‘十二五’期间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现价增长速度高于20%，2015年比2010年至少翻一番”。

此后，《“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商务部会同中宣部、文化部、海关总署等部门共同制定了新版《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引导并推动对外文化贸易的有序发展……

密集出台的利好政策，有效释放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活力，而融资途径的进一步拓宽，则解决了长期困扰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形成了政府项目补贴、银行信贷、企业债、企业股权投融资、公开发行股票、信托、保险、担保等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资途径，银行信贷、民间投资和企业股权融资已构成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资的3大主体。

据悉，去年我国文化产业来自银行信贷的额度逾1000亿元，企业股权融资约为400亿元，各级政府的补贴和奖励资金约为300亿元，17家文化企业上市募资逾100亿元，发行企业债融资规模在20亿至30亿元，而民间投资难以测算，保守估计会超过1000亿元。

补齐短板“快步跑”

加快我国文化贸易发展，仍需补齐短板，着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新闻吹风会上，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赵海生表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逐年增长，出口范围不断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模式也从单纯的贸易型向投资性转变，一批优秀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成功进军海外市场，部分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本竞争，中国文化企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参与度日渐深入，并展现出实力和潜力。

虽然成绩显著，但我国文化贸易的短板仍十

分明显，除品牌少、人才短缺等问题外，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还存在内容产品逆差严重、发展速度落后于国家对外贸易总体增幅、出口种类单一等问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各地建有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多达550多个，但企业培育不良、园区主题偏离、效益参差不齐等问题较为突出。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补齐短板，有效提升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水平，夯实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

据悉，从2007年开始，商务部、文化部等部门每两年评选一次“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旨在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推动文化出口的品牌建设。目前，全国共有485家企业、108个项目获得2011—2012年度“双重点”称号，它们已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主力军。

不仅如此，各地各部门还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新路径。去年3月，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揭牌成立，该保税区由此成为国内首个“文化保税区”，并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化产品交易市场。在北京海关等部门的协助下，中影股份公司以保税加工模式拿下中国电影加工贸易海外第一单，迈出了中国影视后期制作开拓国际市场的一大步。

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出口对于拉动一国经济增长、改善国际收支、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占GDP比重平均在10%左右，特别是美国，其影视、音像制品、图书出版等文化产品出口规模已超过航天工业，跃居其出口贸易首位，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达43%。相比之下，去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但占GDP比重仍相对较低。

据悉，目前我国已确立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为核心的发展原则，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信息保障、平台搭建、人才培养等方式，加快引导和扶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以更大步伐走出去。

(来源：《经济日报》)

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

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截止2013年1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报告的区域贸易协议共有546个,其中354个已经实施。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都有参加一个或者多个自由贸易协议。而经济规模最大的几个自由贸易区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北美自由贸易区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三国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面积覆盖2158万平方公里,人口4.6亿。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三国GDP总量为17.2万亿美元。

协定的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由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又称欧洲共同市场,简称欧共体)发展而来的,初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卢森堡。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荷卢比三国经济联盟、欧洲共同体、欧盟。其实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人口5亿,GDP16.106万亿美元。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欧盟的盟旗是蓝色底上的十二星旗,不是因为欧盟一开始只有12个国家,代表了欧盟的开端,而是这个十二星旗代表的是圣母玛利亚的十二星冠,寓意圣母玛利亚将永远保佑欧洲联盟。欧盟27国总面积432.2万平方公里。

欧洲联盟(欧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

的27会员国,主要位于欧洲。它成立于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新领域的政策,以现有的欧洲社会,与5亿市民,欧盟相结合产生的估计有30%的份额,世界各地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目前,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的经济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欧盟不仅因为新加入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市场容量,而且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的国家集团和商品与服务出口的国家集团,再加上欧盟相对宽容的对外技术交流与发展合作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欧盟可以称得上是个经济“巨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目前美国正在积极推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欧美自由贸易区谈判。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12国,GDP占世界35%,美欧自由贸易区拥有世界GDP40%和约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欧美自由贸易谈判确定的贸易规则很可能成为世界贸易新规则。美国《外交官》杂志称该协议有“终结亚洲世纪”的态势。

而目前正在开始首轮谈判的中日韩贸易区一旦建成,将拥有15亿人口,14万亿美元的GDP,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五分之一。三国之间相互贸易总额已经达到6900亿美元。

非洲目前共有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7个大洲内贸易区。非盟第18届峰会决定,非洲要在2017年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实现以上自由贸易区的整合。

(来源:《财经网》)

七届一次会员大会暨七届一次理事会掠影



张祥会长向新当选的部分副会长颁发证书



前会长沙麟和会长张祥

前常务副会长张鳌和副会长秘书长陈积芳



协会五、六、七届会长部分副会长聚会